

生活  
学术  
思想

主编 靳大成 奚耀华



丁东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主编 孙天成 姜维平

生活  
学术  
思想

# 精神的流浪

丁东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的流浪/丁东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4

(学术·思想·生活丛书/勒大成, 奚耀华主编)

ISBN 7-5059-3539-9

I. 精… II. 丁…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5551 号

|      |                           |
|------|---------------------------|
| 书 名  | “思想·学术·生活丛书”<br>精神的流浪     |
| 作 者  | 丁 东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
| 地 址  |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苏 晶                       |
| 责任印制 | 邢尔威                       |
| 印 刷  |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字 数  | 109 千字                    |
| 印 张  | 7                         |
| 插 页  | 2 页                       |
| 版 次  |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6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5059-3539-9/I·2704 |
| 定 价  | 12.6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学术·思想·生活丛书——

## 总 序

这套随笔的编辑，意图在于提供这样一种“历史”，它不是司马迁式的宏伟叙事，上下几千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帝王将相，文化精英，谱系严整；也不像剑桥中国某某史，专家学者，精细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事件，层层迭迭，叙述详尽，分析缜密，论述精到；这套随笔，意在提供一系列完全个人化的档案、行状，顶多相当于所谓稗史，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但尚未被编者的知识系统格式化，可以算做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更多地表达作者个人的印象，个体经验的感受，个人主观化的对生活的体察，一句话，是个人经验的片断的集束。

有关八、九十年代的学术、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宏观论述、历史分析已经不少了，相关的文化理论论争也仍

DK67/03

然历历在目，余音绕耳，但我们更想了解 and 认识这一代人在跨越了这半个世纪几次历史转折后的内心生活，了解他们在严肃的理论性表达背后的内心冲动和欲望，他们的生活经历造成的倾向，他们的趣味、感觉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他们整个学术、思想的潜在的影响。这是真正的初始条件（混沌理论中有关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的原理），抽象的理论表述已经过多地将这种印记抹去，使我们不了解一个思想产生的条件、来源、过程，不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用和我们不同的方式去观察，去言说。对此，只有让作者自己不受干扰地随心所欲地叙说，将那些冰山下面的东西展示出来，我们才能知道，尼采所说的纪录那些思想实际降临的原始状况，会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多么不同于完整的、格式化了的抽象的理论表达的生活景观。

为此，我们选择作者队伍时，不再按照职业、观点、立场的某种统一的标准，也不理会学院派还是民间派，自由职业者还是高居庙堂的权威，而是像洗牌一样，带有相当的随机性。每一辑的作者队伍的组成都不一样，但选取的角度和视域也有一定的范围。不管作者的社会角色如何，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讲故事的人，他所说的一切，只是他自己独特的经历、体验，只表明了他的生活兴趣之所在，只构成一个小小的片断。当这些片断的集束被我们摆放在一起，并开始

像洗牌一样地随意组合时，我们会从中感受到不同的东西，由此而深化和丰富了对经历过的当代生活的认识。

在编辑这些书稿时，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历史并不自然而然地“在”那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历史只是从某个跟我有关的时刻才开始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与历史的关系，一定与某个时刻的遭遇有关。我是从八、九十年代之交才开始知道我是生活在以“新时期”命名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及其整个现代化一百多年的历史，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并不遥远，我分明地感觉到了那位古代圣贤在他与弟子的谈话纪录中的声音，竟是如此直接、具体、息息相通。正是从这时开始，历史对我来说跟以往不一样了。十年前的这个体验，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最初动因。我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与作者们实现对话、交流，并且能打开自己的记忆窗口，看到那个就存在于你的内心深处，但你平时却不曾留意并不能时时意识到的不同的生活世界。

靳大成

1999. 11. 10

## 目 录

- 一 文革风暴 / 1
- 二 上山下乡 / 14
- 三 理想幻灭 / 24
- 四 机关风雨 / 35
- 五 重返校园 / 43
- 六 编辑往事 / 52
- 七 清理思路 / 57
- 八 混在北京 / 66
- 九 提前退休 / 87
- 十 几本随笔 / 104
- 十一 回忆小波 / 114
- 十二 民间思想 (上) / 123

- 十三 走近顾准 / 137
- 十四 民间思想（下） / 147
- 十五 书海弄潮 / 162
- 十六 刊林客串 / 191
- 十七 转益多师 / 197



## 一 文革风暴

文革那年，我 15 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文革前的我，学业一直顺利。小学考上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即原来的师大附小，中学考上了师大一附中，都是名牌学校。那时虽然也开始讲思想革命化，但学校里还是功课好的学生吃香。从家庭到学校，对我似乎只有一种要求，那就是把功课学好，将来要考上名牌大学，以后当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从我来说，似乎也有这种能力。小学的时候，在教学竞赛里就得过两次奖，一篇作文，也上了学校铅印的小册子。

文革的风暴，过早地把我们这一代卷进了政治旋涡。

1966 年 6 月 1 日，聂元梓等 7 人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学校开始停课。当时还是贪玩的年纪，不

上课觉得很兴奋。又过了几天，广播了北京女一中心高三·四班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我当时还不可能理解这些变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对于突如其来的风暴既感到新鲜，也感到意外。学校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先是在礼堂贴出批判彭真的大字报，接着火烧到校领导的头上。校领导班子先是抛出一位名叫郑炎的副校长，但这根本满足不了学生的革命胃口，很快整个校领导班子都成了革命对象。当时，北京的中学由团中央派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是从农村四清工作队赶回来的，还不太适应学校的气氛。所以一进校亮相就被喝了倒彩。接着又组成以团中央某部长为组长的第二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吸收了当时还在学校读高一的国家主席的女儿等五名学生为组员，并任命她为文革主任。我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已经感受到高于子女的特殊地位。如果说，文革前学生中谁学习成绩好谁受尊敬，或者谁体育运动拔尖谁引人注目，那么，文革开始后，衡量三六九等的尺度就剩家庭出身这一条了。当时，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种家庭出身叫“红五类”。我们那所中学，建于20世纪初，历史悠久，名气较大，离中南海又不远，所以中央领导

人的子女就有好几个在这里念书，父母是部级、司级的更是不计其数。文革开始后，高干子女先得上层消息，显得格外活跃，一派要接班的架式。我自己从小学到初中，考学一直顺利，经济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精神上没受过什么委屈。文革开始后，强调家庭出身，我一下子就感到矮了一等。我父亲是民主建国会的普通干部，母亲是31中学的实验室管理员，按当时的成份划分算职员，即非趾高气昂的“红五类”，也非任人训斥辱骂的“黑五类”。虽然没有挨整，但内心的深处猛然感到一阵压抑。

我们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八·一八”登上观礼台接受老人家检阅的非他们莫属。接着，他们大开武戒，把学校的领导和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教师打入劳改队，剃了阴阳头，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校长书记们都被整得狼狈不堪，记得有一次看见学校的一位女书记被剃了光头，成了小尼姑的模样。而从街道上抓来的“黑五类”，更是被打得头破血流。自己当时看到这种场面，内心并没有升起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怜悯，而是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现在反思，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自己当时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没有多少人文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

只是斗争，斗争，斗争，是对敌人要向严冬般冷酷无情。所以，我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那是一个争相革命的年代，在学校里，轮不上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里参加“革命”，跟着年纪大一点的学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楼居民主动交出“四旧”。我们那个院里，不过 100 来户人家，交上来的“四旧”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书籍，就不下万册。有外文书，也有古书，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里住的都是民主党派成员，他们经历了“反右”之后，已经是惊弓之鸟；这次运动来头更大，全楼弥漫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大家巴不得主动交出一点“四旧”过关，也顾不上心疼书籍的价值了。

那一阵，许多人家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销毁各种容易招来麻烦的东西。有一家从抽水马桶销毁东西，把全楼的下水道堵了，粪便都溢了出来。

不久风暴就刮到我家。我祖父是城市贫民，成份没什么问题，但外公家比较富裕。外公去世很早，外婆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是家庭妇女，所以多年无所谓成份可言，文革开始后，到处划成份。一个堂舅来信说，在我外祖母名下有二亩坟

田。我父亲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接到信，慌忙到同住一院的机关领导家里汇报，问是否要把外祖母赶回原籍。还好那位领导的妻子是一个善良妇女，她从旁拦住：二亩田算什么地主？老太太都80多岁了，赶回去不被红卫兵打死，路上也难保性命。外婆没走，也就没事。虽然虚惊一场，后来还是活到90岁，得以善终。我母亲现在说起那位领导的妻子，直夸她真是好人。

接着，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正赶上一个中专学校的红卫兵来我们这片宿舍抄家，院里不知谁看我家不顺眼，唆使红卫兵闯进我家翻起来。家里人都慌了神。还好父亲的机关闻讯，赶来证明我家既不是当权派，也没有历史问题。红卫兵又把已经装了车要抄走的东西送回来。我父亲为了表示支持红卫兵革命，只好主动把一些有封资修嫌疑的东西让红卫兵拿走，其中有我姨的两件首饰，是前些时她害怕抄家，存在我家里的。

后来破四旧的风暴过去了，就开始了大串连。我和两个同学从北京到武汉、桂林、湛江、广州、井冈山转了一圈，其中从广州到井冈山是步行，回来已是冬天。到家后，才知道我母亲作为中学教职员，也到武汉串连，实际上是串亲戚，到舅舅家住了半个月。

到了1967年，学生们大多串连归来，学校通知要复课闹革命。先是进驻了一批通信兵司令部的干部，主持军训。后来又进驻了工宣队。同学当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思潮和组织。同班的刘洪生、周绍元、陈小文、张光明四个同学已经开始对当时的主流路线发生怀疑，由中央文革到林彪，最后干脆怀疑到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写了文章，直到把教室里的毛泽东像贴上房顶，终于东窗事发，被抄家逮捕。我当时思想很正统，支配头脑的是掺着宗派情绪的愚忠。因为自己参加的组织 and 这几个同学的组织有摩擦，所以写了长达万言的批判文章，批判这几个同学的“反动思想”。当时文章是怎么写的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刻意模仿戚本禹、姚文元那种大帽子唬人，以势压人的笔法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霸道逻辑，感觉这下子总算是走上革命前线。现在想起来，既十分内疚，又可悲可笑。那几个同学其实是最早的反抗者，被关押了半年多，吃了不少皮肉之苦，才放出来上山下乡。我因为能写两笔文章，被吸收到学校革委办小报。平时住在学校，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小报的内容无非是跟着当时隔一段就由两报一刊发表的所谓最新最高指示唱高调。哪天上级预报要发表最新指示，马上守在收音机前，边

听新闻联播边记录。大多数师生，列队上街庆祝。我们则是按照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过夜的原则，守在油印机前，连夜印刷。老人家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些片言只语后面有什么背景，当时既不可能知道，也没有能力去想。只是怀着一种盲目，还以为干着多么高尚的事业。如果说革命也能让青少年上瘾，当时上的就是这种瘾。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一点编辑业务的初步知识，就是在那时学下的。

文革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登峰造极的年代。对于老三届这一代人来说，绝大多数当时在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氛围当中都随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过人，整过人，甚至打过人。这当然应该忏悔。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回避忏悔，乃至回避这段历史。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受到一种非历史态度的对待，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碍，他们当然希望尽量地回避，哪有心情去公开地忏悔？再比如，有些老红卫兵，过去总爱吹嘘自己当年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现在又强调自己受迫害，走麦城。他们按照不同时期的要求不断改变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这是为着在今天获得更加有利的社会地位。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不足为奇。还有一些老三届感到委屈，觉得舆论对他们不公正。的确，这

一代人，在文革发生的年代还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们既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也不是文革的决策者。文革的真正发动者和决策者是老人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笔下，文革往往被简化为红卫兵的暴行。从现象上看，也许这不无根据，但从实质看，这就放过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某些青年人即使在文革中风云一时，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充当高层执政者的工具而已。如果不能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公正地分析，反思文革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青春无悔”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正是对某种不公正的舆论的情绪宣泄。

当然，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即使弄清了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责任，我们老三届这一代对自己的历史也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十几年前这一代人曾经嘲笑老一代死抱僵化的传统不放。如果这一代人今天也死抱着“青春无悔”的心态不放，自己也将很快成为新一代人眼中的唐·吉珂德。可悔的应该是造就这一代人的政治文化，无悔的是这一代人正好是这种文化的掘墓人。

当然，我也不赞成把“红卫兵思维”、“红卫兵心态”泛化，当作嘲笑每一代青年人的口实。即便是这一代里当过红卫兵或造反派的文革积极参加者，他们身上也还是有一些可贵的东西，是需要挖



掘出来，加以发扬的。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从驯服工具到盲目造反，再到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转变过程。正因为这个过程是从这一代人身上发生和完成，所以我们在从传统社会走上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

自发的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红卫兵的名称还在。一度，红卫兵取代了共青团，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但自各地革委会成立之后，政权已经从体制上修复。名为红卫兵的青少年组织已经不具有文革初期那种造反的性质了。

现在，人们把红卫兵当成愚昧、血腥的符号，主要是指老红卫兵的破四旧、打老师和造反派批斗老干部。其实，这种愚昧和血腥并非红卫兵首创。红卫兵、造反派和以前历次运动的不同点仅仅在于具有自发性和游离于体制之外。所以，文革前历次运动中整错人的干部照样得以重用，而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下场都很不妙。但也正因为这一代青年最先吞食盲从的苦果，命运本身就促使他们选择怀疑。这便是盲目造反和走向怀疑之间的逻辑联系。

造反作为一种破坏性思维和行为，现在已经为人们所唾弃。现代的怀疑精神与造反这种定于一尊、你下我上、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不同，它是要